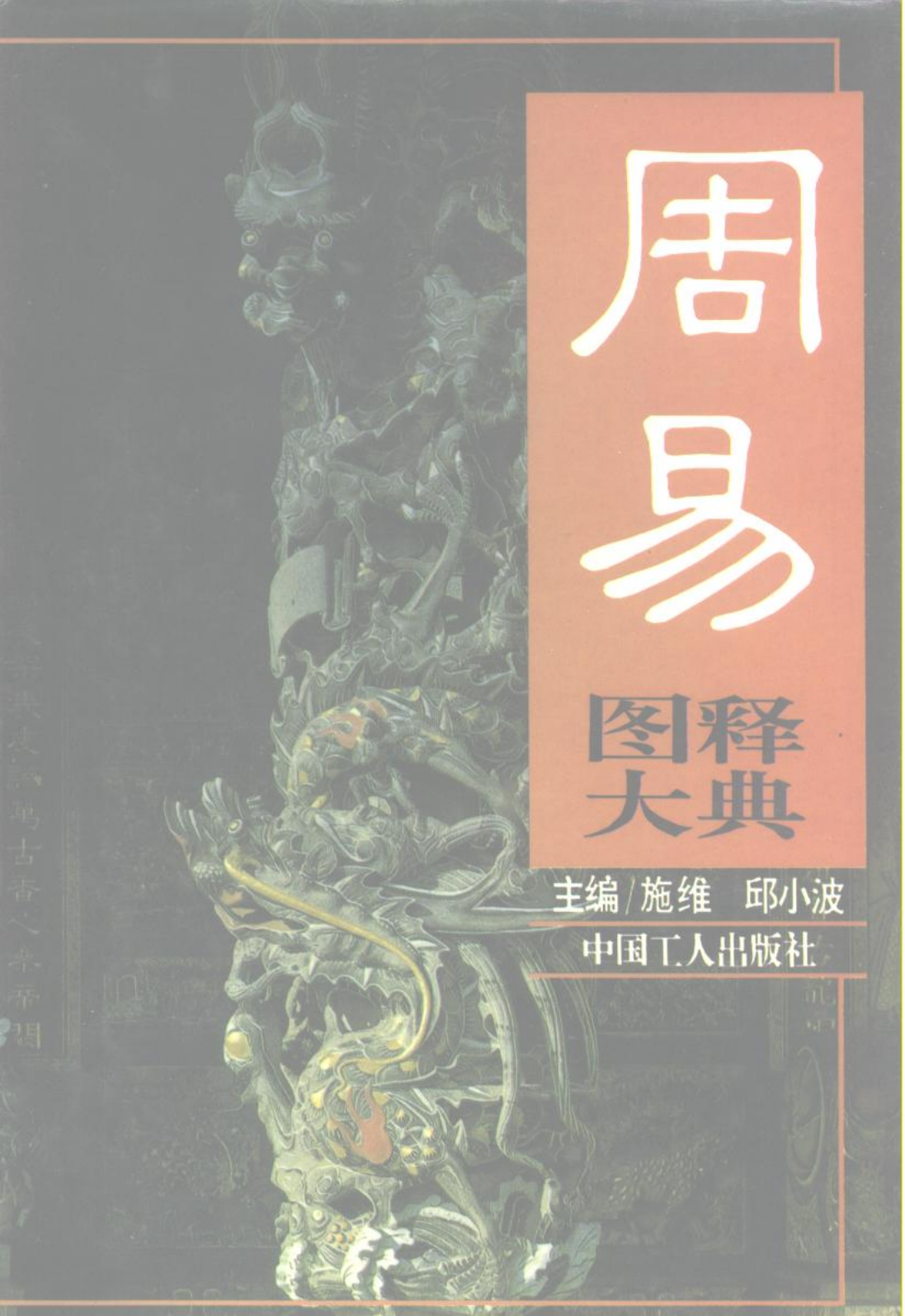




周易

图释大典

主编/施维 邱小波

中国工人出版社

《周易图释大典》

策 划
主 编
副主编

施 维
施 维
赵 济
屈 敬
慈

邱小波
王 旨
张 泽
富 昆

中国工人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易图释大典/施维,邱小波主编.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9

ISBN 7-5008-1388-0

I. 周… I. ①施… ②邱… III. 周易—图解 IV. B22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6894 号

21124/05

周易图释大典

施维 等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通县京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56.125

字数 1240 千字 印数 5000—8060

1994 年 12 月第一版 1995 年 9 月第二次印刷

ISBN 7-5008-1388-6/B.66(精)

定价:75.00 元(精装)

序 一

宋人治《易》，著作丰富，尤注意“图”“书”的发挥和运用。

所谓“图”“书”，主要指“河图”与“洛书”，是宋人附会并发扬前人注《易》之图而来。这些《易》图又被后人互相附会发明，愈演愈繁，自宋至清，绵延七八百年之久，《易》图据说达到数千种之多，形成宋、元、明、清四代人讲《易》的一支新学派，被称之为“图”“书”之学。

先秦确有“河图”之说，如《尚书·顾命篇》：“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孔子在《论语》中也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但这“河图”到底是什么样子？当时却无人谈及。《系辞》虽说圣人作《易》则之“河图”“洛书”，《管子》一书亦有提及，但历来讲《易》者，由西汉的施、孟、梁丘、京房、费直，到东汉的马融、荀爽、郑玄、虞翻、陆绩，及至魏晋时的王肃、王弼、姚信、王廙、张璠、干宝等，皆无人讲解“河图”、“洛书”是何种形状，唐人陆德明、孔颖达、李鼎祚等，在注《周易》时对“河图”“洛书”也没有具体言及。

汉人如刘歆、孔安国、扬雄、班固等，虽曾谈及，亦是一言带过，且说法往往各有不同。另外，《礼记》、《淮南子》、《易纬·乾凿度》、《论衡》、《白虎通义》等书中提到“河图”“洛书”，亦是泛泛之言。只有郑玄注《系辞》，称“河图”有九篇，“洛书”有

六篇(“九”与“六”相加为十五,倒合于“洛书”之特点),若依郑注,则“河图”“洛书”的内容,当有文字撰述,恐非仅为《易》图,何况郑玄此说,恐本于纬书,纬书晚出,不可为据。

于是,自宋至今,学人多持两种观点:

一、以为宋人之前,未见其图,《易》图之兴,盖肇始于北宋初年的华山道士陈抟,他通过对《易》理的归纳推衍,制成“河图”“洛书”“先天图”“无极图”等《易》图,以发挥《周易》的象数之学,这些《易》图以《周易》之“卦爻反复研求,无不符合”,且其阴阳奇偶也“一一与《易》相应”(《四库全书总目》),其图后经刘牧、邵雍、周敦颐、朱震、朱熹等人的推演、传播和肯定,元明清三代学者的共同繁衍发挥,终于形成了《易》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图”“书”之学。

二、以为宋人之图,虽始于陈抟,但其图乃宋人发挥《系辞》及扬雄《太玄》中的《玄图》和《大戴礼记》的《明堂》及《易纬·乾凿度》之郑玄注文等等而来,这些《易》图虽于《易》有补,但绝非宋人发明。

今人李申先生在作了扎实地考证之后,更指出:“陈抟刻无极图于华山石壁事,令人疑问千重”,基本否定了此说,他认为是“道士们一步一步地把太极图改成了丹图和无极图”(《太极图溯源辨》载《周易研究》1991年第1期)。

笔者以为:《易》图的兴起,特别是“河图”“洛书”等图,绝不是宋人自造,除了上面考证的资料外,还有至今尚未引起学人重视的两点:

(一)隋唐之前,早已有以《易》图解《易》之著。考《隋书·经籍志》之《易》类书目中,有“周易系辞义疏二卷”下注“萧子政撰。梁有周易乾坤三象、周易新图各一卷,又周易玄普图八卷,薛景和撰。”

可证以易图解《易》,梁已有之。

在纬书类中，亦载有“河图二十卷”，下注“梁‘河图’‘洛书’二十四卷，目录一卷”。另有“河图龙文一卷”。

《乾凿度》曰：“故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郑玄于此有一段很长的注文，对九宫作了详细注释。清人胡渭按八卦方位，参照郑玄注文，在其《易图明辨》卷二中列图揭示了宋人“洛书”之“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乃袭《乾凿度》这段文字中，郑玄注“九宫”而得。故先儒以此作为一条很重要的证据，证明了“洛书”乃宋人袭《乾凿度》郑玄之注而造出。

然而，《隋书·经籍志》的“五行术数类”中，已载有“九宫图一卷”“九宫变图一卷”“九宫八卦式蟠龙图一卷”，此“九宫图”“九宫变图”及“九宫八卦式蟠龙图”等，是否即表现《乾凿度》郑注八卦下行“九宫”的易图？宋人是否因为看了这些《易》图，而造出“河图”“洛书”？

（二）如果于此仍有疑问，作为铁证的是：考《旧唐书·礼仪志·礼仪》，“天宝三年，有术士苏嘉庆上言，请于京东朝日坛东置九宫贵神坛……东面曰招摇，正东曰轩辕，东北曰太阴，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摄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龙，五为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上，六八为下……。”此一段文字记载，足以作宋人“洛书”乃袭前人九宫说而出之铁证。亦一九七七年春，在阜阳县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在唐时仍有传授的铁证。

因此，据上所考，宋人“图”“书”之说，绝非宋人自造，唐时于九宫已有“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上，六八为下”之说，“洛书”乃袭前人“九宫”说而出，此点已无半点疑义，故以易图解《易》，由来久矣！隋唐之前，早已有之。至于这些《易》图是何时因何故被逐出解《易》之书的，恐怕要从研究文人相轻史入手，估计是一派得势而另一派失势的结果。

《易》图的学术价值，在于它以图谱的形式去说明和探索《周易》的深奥含义，对于推动后世象术、义理、丹道、中医、堪舆、占筮等等方面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周易图释大典》洋洋百余万言，收图千余幅，使读者存一书而可见《易》图发生及发展之大概。故此书的付梓，使我备感欣慰，仅赘语如上以记之。

刘大钧

壬申年辰月

于运乾书斋

序 二

施维等一批青年学者历经数载，广泛收集，精心校审所编纂的《周易图释大典》集易图之大成。此书的问世必将大有功于学界，对于进一步推动易学的深入研究和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周易》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它的显著特点就是义理和象数的统一。自王弼扫象以后，易学即分为义理和象数两派，长期以来义理派占主导地位。北宋初年，陈希夷开创易学图书一派，经过其后继者的不断努力，图书派兴盛起来，形成易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派别。由于义理派长期占主导地位，所以对义理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精备和深入的程度。历史上，有以儒学解易者；有以道学解易者；有以佛学解易者；有以理学解易者；有以心学解易者；当代，有以马克思主义解易者等等。但是，长期以来对象数派和图书派的研究却很不够，其主要原因有：人们受左的思想影响；资料难以寻找；畏惧深奥难懂。总之，这是易学研究的一个空白。对图书派易学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是弘扬祖国传统文化所必需的。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并且都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它是我们民族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根据，是我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

我们民族实现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在吸收全人类的先进文化和继承优秀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设民族新文化，是当代中华民族的重要任务。对于民族传统文化，必须采取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曾经指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论联合政府》），必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继承其科学的有价值的部分和内容，对待图书派易学的态度也必须如此。

图书派易学内容极为丰富，其中包含着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历代易学家根据易学原理及其与其他学科相联系创制出不少的易图，或对易图作出自己的解释，阐发自己的学术思想，因此，易图不但繁多，而且内容涉及到诸多学科，诸如哲学、数学、天文、历法、地理、音律、医学、养生、军事等等。这些学科是构成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易图进行研究，有利于推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

图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极重要的形式，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但古代是这样，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尤其是这样。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有些认识对象可以用概念、判断等文字形式来说明；有些认识对象只能用图或只有用图才能更清楚而形象地说明。历史上，易图解释和说明了某些宇宙现象，为认识某些宇宙现象起过积极的作用，具有客观真理的性质。随着人类认识世界的深化，图在认识事物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离开图象，现代科学技术不可想象。在现代科学中，诸如天文图、地图、各种数学图形、原子、分子结构图、物体运动曲线、心脑血管电图、各种统计表，等等，它们清楚地说明对象的状况及其变化规律。因此，图在人类认识史上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易图是古代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但在认识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有些易图在今天还具有它的科学价值。现代科学所揭示的某些结论与某些易图相一致，或为某

些科学模型的建立提供了思维模式等等。总之，易理和易图在现代科学中有它一定的地位，新的易学派别——科学易的形成，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图书派易学本来是陈希夷及其后学的创新，他们依据易学原理，吸收了道教的一些内容，是发展了的易学，但其开创者陈希夷不承认是创新，托之为伏羲易学，因而招来了不少的批评，争讼不已。清代胡渭专门著《易图明辨》驳斥图书之学，指出：“吾谓先天之图与圣人之易，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图书之说，虽言之有故，执之成理，乃修炼、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总之，一切之争讼皆因托之伏羲而招来的。如果陈希夷承认图书之学是其创新，而且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么似乎一切争讼的价值就不大了。

“托古”和“述而不作”是我国的文化传统，其实这是不好的文化传统。创新就是创新，不必托之古代先哲。事实上，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民族，只不过其创新往往掩盖在“托古”的外衣之下。自称“述而不作”的孔子，实际上就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家。“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之争，实质上是因袭还是创新之争。“我注六经”往往缺乏生气，少有创见；“六经注我”富有朝气，多有创见。学术思想的发展不应受制于某个先哲或某些经典，而应该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创新、发展，使之日新不已。这是陈希夷创立图书派易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迪。

《周易图释大典》是以历史演进的先后为次序，以易学家著作为单位收集整理的，采用这样的方法使读者对某一易学家的易图和易图的历史演变过程均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同一名称的易图有不同的画法，相同画法的易图又有不同的解释，这些都说明图书派易学内容的丰富性。《周易图释大典》的出版，填补了易学研究的空白，是深入研究图书学的宝贵资料。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有的易图抹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有的易图难免有穿凿附会之处，阅览者和易图研究者当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审视之。自古以来，卜筮都不是易学发展的主流。图书学自有它自己的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如果有人借以宣传卜筮，是和易学发展的主流相抵牾的。今天是科学昌明的时代，易学应沿着正确的科学的方向发展。

陈德述

1992年5月于成都

编 纂 说 明

一 易图的渊源、意义和价值

《易经》图象源远流长。“河图”、“洛书”之说早见于先秦、两汉诸典，如“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尚书·顾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经·系辞》)；“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由叙”(《汉书·五行志赞》)，而在南朝和唐代也已可见以图解《易》的滥觞，如梁代的《周易新图》一卷、《周易普玄图》八卷(《隋书·经籍志》)，唐代的《大衍玄图》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可惜的是，这些图学著作和它们记载的易图，早已湮没不传，无从稽考了。

五代末北宋初年，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华山方士陈抟的出现，揭开了宋代《易经》图象兴盛的序幕。

陈抟，字图南，自号扶摇子，亳州真源(安徽亳县)人，长于“养生知来”，被宋太宗誉为方外高士，并赐号“希夷先生”。他通过对易理的归纳推演，制成了“河图”、“洛书”、“先天图”、“太极图”等易图，藉以发挥《易经》象数学。这些奇妙复杂的易图不但以《易经》之“卦爻反复研求，无不符合”，而且其阴阳奇偶也“一一与易相应”(《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

陈抟传世的这些易图形成了三大谱系，去陈未远的宋代易学家朱震(1072——1138)考证说：“国家龙兴，异人间出，濮

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颐、程颢”。（《进周易表》）在这三大谱系中，又以邵雍、刘牧、周敦颐为代表，于后世影响极大。其中，邵雍据“先天图”撰《皇极经世书》，刘牧据“河图”、“洛书”著《易数钩隐图》，周敦颐又据“太极图”作《太极图说》。其后朱震著《汉上易传》，朱熹著《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对《易经》图象进一步肯定、推演、传播，终于在宋代形成了易学史上融象、数、理为一体的图书之学。元、明、清三代图书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学者们参同会融，繁衍其说，以图解易的著作愈来愈多，图象涉及的领域也愈加广阔，出现了一批质量上乘的图书学著作，对近现代的易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于易图的渊源、意义和价值，从宋以来即争讼不断，表现了图书学派与疑古派长期的学术分歧。赞成易图的认为“图虽无文，吾终日而未尝离乎是，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邵雍）；“卦图所以解剥《彖》、《象》，推广《说卦》，断古今之疑，发不尽之意，弥逢《易传》之阙者也”（朱震）；“此图（交泰图）春分则艮为震，兑为巽，秋分则震为艮，巽为兑，可以验四卦之升降，观阴阳之变化矣。”（张行成）；“且将图玩，玩之既久，读易自有长进”；“太极中分一气旋，两仪四象五行全，先天八卦浑沦县，万物何尝出此图”（来知德）；“然有卦有图，其不能示不能书者，可于卦图推之”（刘一民）；“《周易》，传道之书也，道理显于文字，肇于图书。图也者，数之聚，象之设，而理之寓也。‘河图’、‘洛书’，天以图示也，先天八卦，圣人以图教也……顾文字浩繁而图象简约，文字显易而图象隐深，藏万于一，纳须弥于芥子，穷幽测奥，实费且难。舍其隐，务其显，守其易，置其难，是逐浩渺于洪流，而未探泉源之不匮矣，宁能彻《周易》之

图的目的是要将易学推向神秘和空泛，而是以图谱的形式去探索、解释《易经》之精蕴，从而蹊径独得；并把苦思冥索后的心得体会表现在图上，从而“藏万于一”，以便后人观玩研究。同时，《易经》图象涉猎极广，其内容跨越哲学、象数、术理、天文、气功、医学、数学、音乐、地理、军事、堪舆、奇门遁甲、占卜推步等诸多领域，可以被看作是对《易经》的全方位地求索创新。

图书学的兴盛发展，硕硕成果给予后代学术和科技研究以重要启迪和深远影响。清代经学大师廖平曾将《易经》和《内经》反复印证，证实了《内经》的理论本于《易经》，而《易经》之数理又则取于“河图”、“洛书”。因此，要打开《内经》这座宝库，就必须从河、洛这条线索着手。现代一些学者也已指出，“河图”、“洛书”、“太极图”等易图是研究易学原理的重要图象，大而言之，可视为宇宙模式，包罗了天地万物的共通规律；小而言之，可看作揭示人体潜能的秘码，穷幽测隐，奥妙无穷。作为古老的东方智慧，易图也早已冲破时空的藩篱，作出了世界性的贡献。德国科学家、数学二进位制的发明者莱布尼兹按照“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和“次序图”的图象，以阴爻作0，阳爻作1，得到了从0至63的二进位数学体系，并于1901年发表了《易经卦爻与二进位数学的同一性》的论文。据蔡福裔《河洛考》，爱因斯坦也曾将河洛数理结合时空相对论进行推衍，受到很大启发。

由此可见，以科学的态度运用“藏万于一”的《易经》图象，对今人汲取古代圣哲们的智慧，启迪灵感，创造新知，具有重要意义。

二《大典》编纂缘起

宋以后易图不断增多，编者几年来在各类古代典籍中记下的易图即有二千余幅。这些易图下大都有解说、阐释的文字，即所

谓“图说”。历代传留下来的易图及其图说是我国历代学者对《易经》这部“卜筮之书”不断探索的记录，其中不乏学术的精华和智慧的火花。然而，历代易图散载于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极难查找，常使古今失之交臂。因此，为使喜好易图的学者和爱好者举一书而见易图发生发展之大概，尽得古人以图解易之精华，于是历经数年，多方收集、整理，编纂了这本集历代易图及图说之大成的《大典》。我们希望这本《大典》不但能为易学研究者提供纵横参照，取精用宏的文献资料，从对易图奇异巧妙的布局安排的体悟中，进入豁然开朗的神奇境界，创造出更新的研究成果，也希望那些仅仅注意到易图与算卦、丹道等的内在渊源而不去探讨易图的精义奥蕴、奇妙构思的读者在领略易图发生发展的全貌后，能逐步认识到它的价值和真谛。

本书收录的易图共 1240 余幅，分别载于宋、元、明、清四代 43 位易学家的五十种易著当中，基本包括了历代易图的精华。但由于受资料和篇幅的限制，尚有许多易图未能收入。同时，还有很多易图虽已复制，但所据版本较差，图象模糊，又无本可补，难以修复，也只好阙焉不录。目前，我们还在继续收集这次遗漏的易图，寻求更好的版本，为编纂《周易图释大典续编》作准备，希望今后能为读者奉上《易经》图谱的全璧。

三《周易图释大典》的编纂体例

(一) 以单种易著为单位收编整理易图，图下附作者对易图的阐释（解说），各书的排例依时代先后为序。

(二) 各书所录图谱如与前人完全相同，其图说又无独见或未增加新的资料者即删去不录。如元代张理《大易象数钩深图》《乾坤易简之图》至《既济未济合律之图》凡六十四图，皆与宋佚名所辑《周易图》所载图象、文字基本相同，盖从后者书中录出，即予删节。

(三) 有的易图没有图说，如其图为前人所无，则予收录，

否则不取。

(四) 以图书学派的著作为主，兼取部分确有价值的疑古派(反图书学派)的著作，以便读者从正反两方面了解易图的功过得失。如清代著名学者胡渭的《易图明辨》虽主攻易图之失，却能穷溯图书的本末源流，“一一抉所自来”，就连图书学派的大师杭辛斋也不能不叹其精博。

(五)《大典》“解说”部分为历代学者对各自所收或所作易图的阐释，编者不再另加新的评介或解析。因为至今关于易图的问题仍是见仁见智，所以欲以一家之言来解析历代众多的易图是不现实的。同时，《大典》作为易图工具书，以提供资料、线索为目的，而不以褒贬学术、整齐划一为能事。因此，仅将古人图说收录整理，提供易图研究资料，庶几可免蛇足之嫌。

(六)《大典》所收之书，凡有二种以上版本者，以所见最佳者为底本，而参校别本，补正缺讹，为节篇幅，不出校记。凡原书图象模糊不清者，用善本补换后，皆由专人修复。如图毁伤太甚，又无本可补，修补无据者，则付阙如。

(七)“解说”部分一律采用新式标点，对原书引文仅用冒号，不用引号。近年来已有多位学者撰文建议于古人引文不宜用引号，盖因为古人引文多据文意而引也。

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大典》不以图(如分别以“太极图”、“卦气图”)为单位收编易图，而以历代学者的“解说”为序，这是因为易图的情况比较复杂。即以“太极图”为例，所见著录即有数种之多，有陈图南(抃)本图，有周敦颐的空心圆太极图，有赵撝谦、胡渭的阴阳鱼图(此图始称“天地自然之图”，但后来却最为流行，成了道教的标志，气功的会徽，甚至被画在大韩民国的国旗上)。又如“河图”、“洛书”这两幅最基本的易图，也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派以图九书十为说，始于刘牧《易数钩隐图》，认为“河图”数是四十五，“洛书”数是五十五。一派以图